

这个“五七干校”，全名叫“反修防修五七干校”，地处湘潭市远郊的茅山冲。有山有谷有树有花有水田有菜地，一栋栋的土坯茅草房，散落在山边、田畔、树林中。1969年冬，本市文艺界各个行当的人物，当然是多多少少有些问题的人物，都被遣送到这里来了。

我是戏工室的专业作家，曾写过几出古装戏，颂扬的是封建朝代的贤臣良将，属阶级立场有严重错误，被批得昏天黑地。能够来干校，我反觉轻松，比在单位没完没了地写检讨强胜百倍。白天劳动，晚上开会，然后上床睡觉。就是总觉得饥肠辘辘，一餐一钵饭，一碟缺油多盐的小菜，荤腥是难得一见的。在家时，妻子亲操厨事，让我吃得饱也吃得好，从没有饥饿的感觉。我是典型的“君子远庖厨”，不会也不想做炒菜，除了看书和写戏，什么事都不干了。

我当时40岁，正是要大量消耗能量的时候，饥饿的煎熬让我度日如年。

戏剧界的人分在一个生产队，住在一个大院，每间房住八个人。我和曲艺团的口技演员乐众住上下铺，他上铺我下铺。原先虽和他碰过面，但交谊不深。现在都落难了，大家顿感亲热。

乐众52岁了，他爷爷和父亲都是有名的口技演员，可惜都已过世。他7岁开始学艺，干这行40多年了，最拿手的是学百鸟鸣叫，斑鸠、黄鹂、杜鹃、乌鸦、百灵、孔雀、麻雀……惟妙惟肖。他曾随团出访过苏联、南斯拉夫。这是两个修正主义国家，乐众也就有了人生的污点。

乐众把口技叫做“口戏”，远在明代就有了这个称谓。还说他的原籍是北京，祖上是清末著名口戏大师“百鸟张”张昆山入室弟子，以后卖艺南下，就在湘潭定居了。

有一天晚饭后，我对乐众说：“我总觉得饿，难受。您呢，口戏大师？”

“吴致小友，彼此彼此，而且，所有的人都一样。我这辈子，会吃也会做，厨艺是相当好的，会做不少名菜。您呢？”

“蠢才一个，只会吃。”

“只会吃的叫美食家，会吃会做的叫吃家，我是真正的吃家。”

“乐大师，没事时给大家讲讲食谱，应该会有‘望梅止渴’的效果。”

“这是个好题材，我可以说得绘声绘色。”

冰天雪地，我们修了一天的水利，在食堂吃了顿半饱的粗菜淡饭，然后又去会议室学了两个小时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才回到宿舍，洗脸洗脚，再上床睡觉。

10时整，熄灯了。

军宣队、工宣队的人，住在院子外面的那几栋屋子里。

床板的响声此起彼伏，每个人都在床上翻动，睡不着。

我听见上铺的乐众轻轻地坐了起来，接着他操着堂信的语调，高喊一声：“欢迎三位来‘东来顺’，里面请！”接着又说：“涮羊肉三斤，上火锅、调料呵——”

屋里的人止住了任何细小的响动，在屏息静听。

乐众模仿三个客人移动板凳、落座的声音，再模仿一老叟和一对年轻夫妇的对话。

“爹，您先涮！”

“爹，儿媳先给您涮一筷子，这是礼数。”

口戏

□聂鑫森

“你们知道吗？在北京和北方其他地方，这涮羊肉叫做‘野意火锅’，是随满清入关传过来的。‘东来顺’肇兴于1903年，先是设摊；1921年，建起了馆子。此馆第一是羊肉好，选用的是内蒙古集宁的绵羊，且必须是阉割过的重五六十斤的公羊，每头羊宰杀后大约只有15斤左右的肉可供涮用；第二是刀工好，羊肉要冰镇后再切成薄片，一斤肉要切出六寸长、一寸半宽的肉片40至50片；第三是调料好，芝麻酱、绍酒、酱豆腐、腌韭菜花、酱油、辣椒油、虾油、米醋、葱花、香菜末，任其喜好去调配。火旺了，水开了，涮吧。”

我的嘴角流出了涎水，闻到了满屋子的肉香、调料味。

接着，乐众用嘴制造出筷子夹肉与碟子相触的声音、夹着肉在沸水中来回涮动的声音、舀调料搅拌的声音、夹肉入口咀嚼的声音，间或还传出添木炭的声音、火星子爆响的声音。老人手笨，将一个瓷勺掉到了地上，破碎声很清脆。

大家“呵”了一声，好像看见了瓷勺的碎片。乐众忽然说：“今晚我们吃饱吃好了，睡吧，明日还要干活哩。”

这一夜，我睡得很安逸。

我们忽然觉得有盼头了，天再冷，活再重，饭菜再简单，都无所谓了，因为临睡前有一顿让人朵颐大快的晚餐。

说菜谱，有声有色，有场景，有人物，乐众投入了最大的创作热情，这是他过去从没有演过的节目。

松鼠鱼、鲜鲫银丝脍、全蛇宴、佛跳墙、熘白菜、大闸蟹……有的表现制作的全过程，有的表现吃时的真实享受。

这消息不知怎么被别的宿舍的人知道了，熄灯后，悄悄地蹲在我们宿舍的门边、窗前，听乐众说菜谱，好好地“吃”一顿后，再高高兴兴地去安睡。

乐众在水田开秧门的时候，突然被勒令搬出我们宿舍，搬出这个院子，住进院外军宣队、工宣队的那几栋屋子里去，而且是单间。干活也不跟我们在一起，他单独一个人到山冲里一块坡地上去放一群羊，不与任何人接触。

有一回，我因干活砸伤了手，被批准休病假三天。我装着饭后散步的样子，离开大院渐行渐远，去了乐众放羊的地方。我没有走上前去，只是站在一丛灌木后，拨开枝叶往外看。乐众背对着我，站在一群山羊前，大声说菜谱，说的是任过湖南督军的谭延闿家厨做的一道名菜“神仙鱼”，从制作到品尝，声、色、香、味俱全。听完了，我忍不住大喊一声：“好！”

乐众转过身来，拱拱手，说：“我早看见你了，谢谢你来捧场！我在排新节目，总有一天要登台演出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五七干校”烟消云散，我们都回到了各自的单位。

曲艺团举办了“乐众口戏首场演出”，一票难求。乐众打发人上门给我送了一张一排的票，还捎话说，除以往的传统段子之外，说菜谱是重头戏，望莅临捧场。

我当然要去一享耳福、眼福、口福。观众疯狂地为说菜谱鼓掌、喝彩。

乐众说完“神仙鱼”时，忽然现场抓彩，对着我说：“坐在第一排正中的吴致先生，系我在五七干校的同学，对‘神仙鱼’您可中意？”

我站起来，双手抱拳，大声说：“此天下美味，先生是独一份，我谢谢您了！”



秦浩又查看了一下打包的行李，确定无误了才去厨房。

他妻子4点就起来煮了红薯粥，他看了看那半锅粥，舀了一碗，又倒进锅里一小半。妻子并没有注意到，但仍旧习惯性地提醒他“早饭要吃饱”。

秦浩进屋子只看了一眼孩子，没敢亲她。小家伙睡的浅，弄醒了，知道爸爸要走，必然哭天喊地。一个大背包上了肩，手里还有一个大尼龙面子灰突突的行李包，秦浩看着妻子，没有再说话，只是下巴抬了抬。妻子知道其中的含义“我走了，家里靠你了！”

这只是秦浩每年里都要经历的分离，可能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走下楼，秦浩就看见路灯底下已经有两个同伴在那儿抽烟等他了。他们手里都有一个大大的尼龙面子的行李包，在路灯下，包上“锡山矿务局”的印字特别显眼。

那三个字也印入了秦浩的眼睛，他手里也有一个。“锡山矿务局”那三个字在他心里狠狠地戳了一下。

曾经锡山矿务局是这个城市最好的单位，不管是工资、福利，甚至是秦浩背后的那片家属楼，都曾经是这个城市最让人羡慕的。或者换句话说，这个城市就是因为有了锡山矿务局，才建设起来。他们手里这个大行李包，就是某年单位组织外出考察学习时，每个员工发的福利品。而如今，秦浩还得用这个包装起自己的衣衫琐碎，颇为讽刺的是，现在他们都是离开矿务局家属区，而出去打工的。

孤儿

□刘斌立

三个人相互看了看，点了点头，一起朝矿区大门而去。黑黢黢的矿区内，似乎空无一人。路灯已没几盏好的。三个人抽着烟，倒是烟头一亮一亮的，显出了几分活力。大门口的铁门虚关着，他们发现那儿还站着一个人。

“广路，你怎么又来了？”秦浩先发问的。

卫广路把烟头掐了，狠狠用脚踩着，边碾脚边说：“我把娃娃交给妹妹了，这儿不可能找得到工作，我必须出去打工。”

“你走了，你娃儿不是成孤儿了，要不得哦。”另一个声音说。

秦浩赶紧用手止住那人，但是昏暗的灯光中，已看见广

路眼神瞬间黯然了。

“算了算了，走，挣到钱再打算。”一只胳膊拉起广路。

秦浩看了一眼大伙儿，边走边说：“也好，又是我们四个一起，互相有个照顾。”

卫路广和秦浩他们一起在外面打工两年了，可是在家的妻子一直到肺部疼痛到无法忍受才去医院，确诊是肝癌晚期，广路赶回家不到三天，妻子就去世了。这个矿区里，很多职工都死于这个疾病。大家其实都知道，有些工种因为当年缺少劳动保护，身体受到了很大的侵害。本来有一年大家还准备上访争取一些基本权利，但是就在那年，矿区停产了，接着被宣布为资源枯竭。

秦浩他们坐上了早班长途车，他们接下来的两天都会在路上。长途车要走4个小时，把他们带到省城，他们要换火车北上17个小时，到达北方的一个省会城市。

秦浩是第一批走出去的锡山矿务局的工人。他当年是负责矿区锅炉班的班长，锅炉班负责整个矿区的热水供应，三班倒24小时从不停歇。当年矿场停业，秦浩整整一年都无法在这个城市找到工作，因为矿场倒了，几万员工和十几万的家属顿时都没有了生计。而这个大山里的小城市，哪里能够承载得了这个负担呢？

秦浩北上之路，经历了三个城市，最终找到了现在的工作，为一个小区的供暖站负责整个冬季烧锅炉。他站稳脚跟

一个上午

□苏笑嫣

她走在尚在夜色中的大马路，周围是大厦与树梢浓密低沉的阴影，黄色的灯光恍惚迷离，城市处于蒙蒙一片湿漉漉的雾气之中。雨还在下，从前一天晚上持续到此刻的黎明，马路上不均匀地分布着雨水的痕迹，空气阴冷。前些天还是20多度温和的天气，只因一场雨，便迅即降到10度左右。在这座北方的浮华城市里，时光总是有种猝然的畏惧姿态。这时的雨已然小而稀疏，她抱了抱臂，却也只是本能的对寒意的反应，脑中盈满的全是拥堵繁杂。经过停在路边的一辆车时，她稍稍回过神来，愣了一下，摘掉鼻梁上架着的硕大墨镜，后视镜里的女人眼眶淤青。咬了咬干燥的嘴唇，女人又重新将墨镜戴上，双手插进黑色小西装的口袋，没有表情地沿路走了下去。其实她也不知道要去哪里，但是高跟鞋的声音清脆坚定，在空旷的马路上敲击着，弥散进黎明的阴影里。

漫无目的地又走了两三个小时，路边的一家早点铺已经开始了准备，馄饨在大锅里翻滚，冒着腾腾的热气。她记得自己上一次吃东西还是昨天中午的事了，那也只是匆匆地吃了几个糕点，十分甜腻。她总是在忙碌，总是忙碌，只是为了演出和赶场，只是为了能多赚那么几个钱，可是——她又一次咬了咬嘴唇，像昨晚这样遇到喝醉了的客人就可能是这样的后果——被打得眼眶淤青脸庞发肿。她很饿，可是没有胃口，于是接着往“家”走，她觉得手中的烟让人不能清醒，她从来没有清醒过，不知道自己的生活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等她意识到停下来回头去看时，这条路已经不可扭转地往越来越难以理解的方向滑去了。

她从小唱歌好听，在学校里是出了名的，唱歌的时候她很骄傲，课间的时候小朋友们和老师总会说“淑文唱首歌听吧”，于是她便昂着头站起来唱上那么一首，要是时间允许的话，大家要她再唱一首，她就高兴地唱下去。她是骄傲的，但仅仅是在唱歌的时候。虽然在唱歌时她依旧是穿着那件洗得发黄发皱的白色衬衫和棕色直筒的条绒裤子，虽然她依旧是穿着一双妈妈自己纳的毛线的千层底鞋子，虽然她的脸依旧因为干燥而皴裂着、头发散乱，因为没有钱去买软软的雪花膏和那些五颜六色的头绳，但是她站得直直的，扬着小脑袋，好像自己站在一个庄重的舞台上，做着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她是受瞩目的，她是带着光环的小明星。

但更多的時候，她是站在桥上的，而不是舞台上。

忙碌而喧闹的街市里，拿着红白塑料袋和客人讨价还价，把客人要的蔬菜麻利地包进袋子里或者手指在脏兮兮的腰包里收钱找钱来回穿梭。母亲在这座桥的桥头靠卖菜营生，虽然给她取名“淑文”，却半点没依着这名字来栽培女儿的意思，每天在桥上帮忙吆喝是她从小的工作。她们没有门市，一块布摊开来就是她们的摊位，卖廉价的蔬菜，赚微薄的利润。而父亲就在桥的另一头卖水果，有一只小三轮车，装着苹果、梨这些容易储存的水果。有时候父亲去进货，她就坐在三轮车的侧栏上，脚踩在车斗里，迎面的风呼呼吹来，脸生疼，可年纪小，也不觉得有什么，就是盼望着上完所有的货后父亲能在靠近门口的一家店边上停一停，给她买上几只柿饼。

帮着父母来回倒零钱，在桥上来回穿梭。桥上还有好几家摊位，有的卖玩具，有的卖袜子，有的卖小饰品，当然也有卖的菜卖水果。倒零钱时她眼睛也机灵着，观察有没有城管。她不懂警察和城管的區別，总之见到有穿着制服的，就迅速地

跑到两边，边跑边喊“警察来了”，于是整座桥上的小商贩麻利收拾摊位。总有些浑水摸鱼的，趁着这当儿砍价买便宜货的不算，趁乱偷拿东西的也有，她站在母亲身边，是这混乱里明了的眼睛，若是发现了有人偷东西就一把抓住高声尖叫。然而若是邻居的卖家丢落了什么东西，她也是决计要收罗回来的，若是玩具或者小饰品她就收藏起来成为自己的小宝贝。但是她始终也没明白，为什么“警察”不去抓坏人来抓他们做什么。

钥匙转动，发出有些钝了的“咔咔”声，她松开顶住门的膝盖，打开门，看见清晨的阳光倦倦地泼洒进了屋子，自己的影子跨过铝制的门框斜倚向柜子。她这间小小的屋子里没有沙发，只有一只买来的二手老板椅，她窝了进去，却懒得脱鞋，于是一动不动只是盯着暗淡的阳光和阳光下那几只黯淡的破败家具，椅子汗闷闷地散发出化学元素的酸味。空气中流淌着一种无数微尘爆裂的味道。

父母忙于生计，家里的对话几乎全部围绕生意展开，然而大多数时候是沉默。她从小学升入初中，一个自由散漫的中学，又是另一个自由散漫的高中，他们知道她关键考试的成绩，却不知道其过程，不知道她每天在学校的生活，不知道她的朋友们，不知道她关心着些什么，不知道她喜欢上哪个男孩，不知道她是否开心过哭泣过，只是知道她依然是那样默不作声地存在着的，依旧在课外时间里帮着家里的生意，卖菜卖水果收钱找钱算账。他们现在有合法的摊位了，这是他们几年来的努力值得庆幸的事。

多年的吆喝，对处在变声期的女孩还是有影响的，她的声音不再那么的听，她也不再那样扬起头来唱歌了。她渐渐长大了，在新的环境里她知道金钱的重要性，知道那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女生才是骄傲的明星。除了依旧在记忆中的那些人，没有人再知道，当年的她唱歌有多么的好听。她很安分，然而对于歌唱的那份梦想连她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它早就种在了她的腹里，就像一颗被埋没的种子深藏于地下，然而只需要一缕阳光、一股细流的滋润，就足以让它猝然生长成一枝冲天的豌豆藤。

那所散漫的学校，是一些人放纵堕落的温床，却是另一些人培养梦想的工厂。学生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一方面是安分，另一方面是因为自由的环境培育出的无限欲望，她在无形中变成一个处于极端的的人，很少有中间地带。她要的不再是父辈的生活，那种隐晦的向往一直在暗暗滋生。直到那一天，高考落榜，她好像猛地被什么激醒，要么继续卖菜，要么放手一搏，她必须做出选择。她站在火车站上的时候还在犹豫，眼看着车门要关闭了她才终于迈了上去。看着窗外迅速掠过的家乡的树木和土地，她知道，这一去就没有回头路可走。

她只会唱歌。于是她到各个酒吧去试，可她实在太寒酸了，一身不入时的打扮进不了人家的门槛。辗转了两个月，住在地下通道，但每天到公共厕所里洗脸洗头把自己拾掇干净。天冷的时候捧着一只红薯在通道里喃喃自语“会好的，会好的”，然后意识到，竟然开始对自己说话，这并不是在喉咙里不自觉的一声“哎呀”那么简单，而是，一个人在寒冷的地下通道里瑟缩着，剥着一只烤红薯的皮，然后自己对自己说话，不禁默默哭了起来。

那天晚上她到一家叫“浴火”的酒吧去应聘，自然又是无功而返。红色的“浴火”二字辉煌妖娆，站在癫狂起舞的霓虹灯下她觉得自己脚步沉重难以迈动，

舞台上女歌手正唱着《假想敌》，她不由得也哼了起来，一面唱着面流着泪。

“唱歌挺好听的。”

听见男子的声音，她抬起头来，一脸茫然。

“我朋友也是开店的，要不要去试试？”

他叫小圣，大家都这么叫他。因为他的关系，她得到一家叫“迷”的酒吧去唱。她在二楼的台子，楼梯昏暗，铺着水红色布毡，两壁钉有一溜金属镜，暧昧吐光，映得人影扭曲。起先是他给她买了两套裙子，后来是她自己买。她每天就站在那个光怪的舞台上唱歌，唱给自己听。那样的声音并不计较是不是有另外的人在听，空灵又死硬，有自己的气度。于是就这样，她竟然有了自己的小众听众，得以让她就这么唱了下去，并在时间允许的范围多接下场子。然而没有一个位子是白站的，那些磨砺与辛酸每天打磨着她和她的梦想，她不知道自己是距离梦想越来越近了，还是越来越远了。

从她开始在“迷”唱的那天起，她便不再叫“淑文”了。那是多么土气的名字。他们叫她“朵朵朵”。

有时她去他家，径直钻进他的被子里把脸住他怀里扎。他下巴靠在她头顶，轻轻挪动，她的头发就跟着轻轻挪动，她闭着眼，感到一种安全。他们之间没有爱，有的只是关于依靠的一种需要。实际上她并不安全，从来都不。可是假象是一种多么丰沛的感情，支撑人们向前走的，永远都是假象。

她点燃一支烟，把椅子转了四分之三圈就可以反身够到桌子了，那上面放了一只烟灰缸，是从店里拿来的，方形的玻璃，又笨又大，四边可以分别卡住一支烟。桌面上铺着白色梨花的印花棉布，是房间里惟一一件她中意的东西，那是她在一家精致的小店买来的，对她来说并不便宜，可是因为太喜爱还是买下了，粗糙房间里需要一个精细的物件。何况，她看到它的时候会想起母亲，母亲很爱花布，虽然过年的时候是家里生意最忙的时候，但母亲总是会抽空购上些花布回家，做成一些漂亮的小东西，那是母亲少有的停止奔波的样子，终于可以安静平淡地归于生活，让她看到生活和家本来的温馨面貌。

而且，母亲也真的是不那么奔波了。后来母亲给她打电话，日子久了，什么都平静了。母亲依旧不需要知道她在做什么、在什么样的环境、认识了什么样的人，她只需要她在。她给她讲菜又涨价了，讲路边的海棠开了，讲父亲的胃病犯了，告诉她什么季节要吃什么蔬菜对人身体的好，告诉她加减衣服、按时睡觉的烦琐零事。很多时候，末尾会顿一顿，然后说，都挺好的。

都挺好的。她在心里重复了一遍，脸上就笑了。好，是个怎样的概念呢？

安朵朵把墨镜摘下来，想了想，还是给她打了个电话。

“……妈，我是淑文……”

突然听不清母亲的话，耳边只是重复着自己的声音“我是淑文……我是淑文……淑文……”蓦然不明白自己究竟是谁。房间里，金色劫灰滚滚浮起又滚滚沉下。她靠在椅子上，拿着手机，一动不动，直到挂了电话，烟渐渐熄灭了，长长一截烟灰还留在手指间。

苏笑嫣：“90后”青年作家，蒙古族。作品曾在《人民文学》《诗刊》《星星》《青年文学》《民族文学》《美文》等报刊发表。出版有个人文集《蓝色的，是海》，长篇小说《外省娃娃》《终与自己相遇》，长篇童话《紫贝天葵》，诗集《脊背上的花》。

后，陆续把自己锅炉班的一帮弟兄都介绍了过来。工作从每年的深秋囤煤开始干起，到次年春天的3月停止。每个冬天，秦浩能挣到一份相当辛苦但至少能让家人温饱一年的收入。而家乡那个城市对他来说，就是个永远十分想念，但却没有希望的地方。

长途车上，司机开了收音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已经开始播音了。

第一个让秦浩他们打开话匣子的话题是，播音员说为了响应中央关于节能的号召，今年北方城市普遍延后了开始供暖的时间，同时供暖的温度会下降。节能意味着烧炉工工作量减小，虽然只是延后三天，但是秦浩他们似乎已经感觉到今年能拿到手的收入一定会减少了。

大家开始七嘴八舌，但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明年春天烧锅炉的工作一结束，必须得留在当地再找工作，争取多挣点钱再回家。

秦浩没有参与讨论，因为他又听到另外一则新闻。播音员正在念着一串城市的名字，那是国家公布的第二批“资源枯竭性城市”名单。秦浩听到了熟悉的那个名字。

长途车已经盘山走了一段，秦路回过身去，从车窗回望着已经在大山深处的城市。清晨，那些星罗棋布的灯火，只是那个城市里还没有断息的活力。只是离世界越远，就越像一个孤儿，即将被永远地遗忘在大山里了。